

成蹊大學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叢書

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石刚 编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ONG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丛（第1卷）

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

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

石刚 编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4 年 3 月

成蹊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叢書

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

编 著 / 石 刚 © 2004 Seikei University Center for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副 主 编 / 王 毅 印红标 光田刚

责任编辑 / 金 文 郑 文

封面设计 / 晨 曦

发 行 人 / 韩方明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2 座 2006 室

电话: 852 - 2526 5338

传真: 852 - 2536 9223

电邮: hkpress@dragoncom.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4 年 3 月 16 日香港初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 962 - 620 - 088 - X

定 价 / 港币 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成蹊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叢書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是日本成蹊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提供资助完成的研究成果。这个项目自 2000 年 4 月开始启动,前后共历时 4 年。这个构想,起初是在 1999 年春夏之交,我与一位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同事闲聊时萌发的。这位教授对中国的宗教状况以及当时发生的法轮功事件产生兴趣,而我则一直想对后殖民时代的亚洲各国经历的不同文化语言政策历程做一个比较研究。于是我们打算联合组织一个研究项目,开始时拟定的题目就叫做“汉语圈诸区域文化及宗教政策的比较研究”。

在日本,“汉字文化圈”一词较为流行,而“汉语圈诸区域”这个提法则似乎尚未曾见。“汉字文化圈”,从习惯的理解上主要是指日本,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一些过去使用并且目前还在使用汉字的区域。我们开始拟定研究计划时,主要关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港台,新加坡等加以比较考察。因此与“汉字文化圈”习惯上指称的范围有

所不同。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汉字文化圈企图以“汉字文化”这样一个难以界定,本末倒置的概念指称上述文化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广大区域,这本身包含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这个概念很可能单以使用汉字这一表面的特征来遮掩了各区域之间实质性的重大差别。并且汉字文化的说法本身就混淆了汉语和汉字,汉字和汉文化的区别,是一个基于对文字的性质重大误解之上提出的概念,经不起严格推敲。并且如同众所周知,所谓文化圈理论也早已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这样,我们使用“汉语圈诸区域”这个提法就不单纯因为所两者所指范围广狭的不同,而是基于对“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的批判性认识。

语言圈这个提法虽然较为常见,但是认为汉语圈可以涵盖中国大陆,港台,新加坡等通用汉语的地区却也并非无懈可击。其理由有二。第一,首先以大陆为例,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蒙族,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所谓少数民族的传统居住区域属于“汉语圈”。尽管 1949 年以后由于政策性移民等原因,使得这些区域大大改变了其人口比例,而且因政治因素等导致的固有民族语言衰退的状况使人咄目。使用汉语圈来指称这些地区,并不意味在任何意义上对这种状况的无视。相反却应该以此警示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性原因。但是这些需要特别加以解释,并不能算是题中应有之意。第二,汉语一词,作为语言学概念,应该是指作为自然语言的汉藏语系中的一支,作为涵括各

地方言的母概念,它与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新加坡的“华语”等概念所指当然有所不同。但是,这些重要的概念差异却往往被人们忽视。而我们面临的困难在于,恰恰是对这些差异的忽视,掩盖了事情的本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作为自然语言的汉语与普通话,即作为国家的法定公用语而对语音体系,词汇,语法,文字,正书法等加以规范的“国语”(目前只在台湾和香港保存此称呼,在新加坡多称华语),是性质不同的。

作为当初的设想,由我负责组织一批论文,对包括中国以及港台,新加坡等地区近代文化(包括近代的思想,文学,艺术,语言,学术等)的形成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各区域的社会变动与语言文化政策变迁的关系,以及思想,文化与制度性问题的纠葛做深入分析。我的那位同事则着重对当代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以及民族问题进行探讨。

方向定了下来之后,我们开始就打算组织一个国际协调型的研究队伍,相互交流,合作研究。我提出的选题报告也获得学校批准。只是还难于找到合适人选。正巧当年学校命我带领一批学生暑假期间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短期留学,住在勺园。我得以结识了北大的印红标教授并了解到他的研究方向。我和他谈起我的设想,并通过印先生约请社科院文学所(后调至哲学所)的王毅研究员共同商讨。王毅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又兼任《文学遗产》的编辑,十分熟悉国内学术界动向,这正好弥补了我离开国内多年,长期专注于日本近代语言思想

和殖民地语言文化政策研究,因而疏于国内学界情况的缺憾。通过王毅先生的斡旋,我们顺利找到承担各个专题的合适人选,启动了研究进程。

在其后三年的共同研讨过程中,我们的研究人员阵容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最初的合作者由于承接了其他任务,很快就退出了这个项目。这样,使得宗教政策研究方面无法按照原来设想进行,同时其他课题也作了相应调整,修订了原来的方案,准备分阶段达到原定目标。现在提出的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

这本论文集的论文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专论构成。第一是有关文革的研究,王毅,印红标和杨丽君的论文都是这个领域的新作。他们的视点并不局限于文革研究本身,而是更为广阔和深入地涉及到其制度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及其源流,有许多论述和观点都是开创性的。第二方面是有关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论文,王力雄的文章根据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展开论述,堪称力作。第三方面是有关意识形态,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并涉及到思想史和美学问题。其中,张博树关于党化教育的论述,谢泳的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以及干春松围绕冯友兰,梁漱溟在 73 年前后的状况展开的深入讨论,还有吴迪对毛泽东新人新世界理想的解剖,单世联的朱光潜论,都是难得的一家之言,各自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第四是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思想的研究。滨田提示出在多语言,多文化共存的时代汉语标准化所

前 言

面临的课题,石刚则以近代日本的语言思想为参照系概观了百年中国的语文运动和语言政策。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我们的研究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动,原定的有些领域的课题没有能充分展开,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成果。但是这毕竟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预定继续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希望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对此有兴趣的学者同仁给与我们协助和支持,和我们一起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2004 年 3 月 16 日

日本成蹊大学文学部教授 石刚谨识

目 录

前 言	石 刚	I
1、“横扫牛鬼蛇神”成为“文革”纲领的发展过程及其 文化渊源	王 毅	1
2、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印红标	51
3、文革时期集团暴力行为的制度根源	杨丽君	98
4、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王力雄	126
5、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	王力雄	168
6、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张博树	216
7、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	谢 泳	250
8、乌托邦实验：毛泽东的“新人新世界”	吴 迪	303
9、1973 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	干春松	348
10、1949 年后的朱光潜：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	单世联	382
11、什么是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滨田悠美	437
12、百年中国语文运动与语言政策	石 刚	461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书介绍		489

Contents

Preface	SHI Gang	I
1、The Slogan “Sweep away all ox – monsters and snake – demons” became a central ten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Yi	1
2、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ed Guards’ Campaign of Eradicating the Four Olds	YIN Hongbiao	51
3、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YANG Lijun	98
4、Cultural Refection of the Tibet Problem	WANG Lixiong	126
		1

5、Social Functions and Destruc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WANG Lixiong	168
6、The Institutionalizing Process of “Party –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ZHANG Boshu	216
7、The Origin of “Thought Reconstraction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XIE Yong	250
8、The Experiment upon Utopia : Mao Zhedong’s “New People and New World”	WU Di	303
9、Liang SuMing and Feng YouLan in 1973 ...	GAN Chunsong	348
10、Zhu Guang Qian: From liberalism to Marxism	SHAN Shilian	382
11、What is Modern Chinese “Normalization” ?	HAMADA Yumi	437
12、China’s Language Movement and Policy over last 100 Years	SHI Gang	461

“横扫牛鬼蛇神”成为“文革”纲领的发展过程及其文化渊源^{*}

**The slogan “Sweep away all ox – monsters and snake – demons”
became a central ten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王 毅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全面、公开爆发是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的，而这篇社论的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法西斯”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字眼比上面短短的几个字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了，因为它们的每一笔一画给中国带来的，都是成千上

^{*} 笔者于1996年撰写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一书，全书共十二章五十余万字，现待出版。本文是根据其中第二章的内容改写而成的。

万无辜者的惨遭屠戮和横加在亿万国人头上无尽的苦难。在经历了那样巨大的牺牲之后,谁能说我们不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这几个字的渊源呢?借用费尔巴哈的话说:“鬼怪是过去的阴影,鬼怪必定将我们引回到这样的问题:在那鬼怪还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者时,它曾经是什么?”^①

一、“横扫牛鬼蛇神”——贯穿“文革”始终的纲领

作为发动“文革”的纲领性口号,“横扫牛鬼蛇神”的号召和鼓噪充斥了“文革”起始时期的一切报刊,遍布在全国无数的广播、标语和大字报之中。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几个著名文件、以及通过这些文件发布的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例如在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就是把所谓“牛鬼蛇神”的泛滥,作为他发动“文革”的理由:

他们(王毅注: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针对这种局面,《通知》引用了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警句: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

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这段警句后来不仅成了“文革”亿万次暴行中都要被庄重诵读的开场白,而且更成了用来专门对付无数“牛鬼蛇神”的神圣禁咒。再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中习称“十六条”)反复号召:

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观点,批判错误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十天之后的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一次号召: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②

类似的号召还有无数^③,显然,“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把他们现实中和想象中的一切一切敌人统统称为“牛鬼蛇神”。

在上述号召下,揭露和打倒“牛鬼蛇神”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革”的基本目的,例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著名的“造反论”就是由诸如此类的誓言串连而成: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④

“横扫牛鬼蛇神”这一根本目的的确立，使当时的几乎一切具体的暴行都是围绕于此而进行的，例如“剃鬼头”、“挂黑牌”等等人身侮辱，以及“文革”中习用的“黑帮”、“黑线”、“牛棚”、“黑手”、“魔爪”等等最流行的语汇，无一不是把受害者视之为“鬼”。除此之外，当时还流行各种各样的驱鬼术，例如在 1966 年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举行批斗六十余名“黑帮分子”的大会时，就“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⑤“横扫牛鬼蛇神”这一基本目的一直伴随着“文革”的整个发展过程，所以直到十年以后的 1976 年，“四人帮”镇压了清明节前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地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集会活动之后，姚文元即在 4 月 8 日的日记中填词志贺，其文为：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霹雳震，怒激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⑥

词中就充斥了“群魔”、“阴火”、“恶鬼”、“黑风”、“丑类”等等对“牛鬼蛇神”们的诅咒语汇。5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又刊登了姚文元亲自修改、署名梁效的文章：《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文中再一次重复了对“牛鬼蛇神”的指证和诅咒：“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类似的指证和诅咒充斥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中，例如当时“大批判”中心清华